

·调查与思考·

在粤非洲人的迁居状况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

——来自广州、佛山市的调查

柳 林 梁玉成 宋广文 何深静

【摘 要】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吸纳了大量的非洲人,其中又以广州、佛山市的非洲人数量最多。文章选取广州市和佛山市的非洲人为调查对象,以迁居为切入点,探讨非洲人在粤的生存状况。研究发现,该群体的迁居行为较普遍,其居住空间分布呈宏观扩散微观集聚的态势。迁居频率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迁居更频繁;迁居频率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小,受社会支持与融入、政府管控的影响较大,社会支持力度大与融入程度高的迁居频率较低,而政府的管控力度加大会明显提高非洲人的迁居频率。在粤非洲人的迁居存在源于被动而后主动适应的特点,迁居是他们适应当地生存的重要手段。因此当地政府应通过提高社会宽容度、保持适中的执法强度等方式,营造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降低广州、佛山地区非洲人的流动性。

【关键词】在粤非洲人 迁居 政府管控 社会支持 社会融入

【作 者】柳 林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综合地理信息研究中心,教授;梁玉成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宋广文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综合地理信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何深静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设计系,副教授。

一、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涌入中国,出现了较多的“跨国移民社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聚集的外国人占全部国际移民人口的62%,其中,广东所占人数最多,而且非洲裔的人口比例最高(梁玉成,2013)。

^{*} 本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编号:41322003)的阶段性成果。

由于缺乏官方的统计数据,广东的非洲人数量并不清楚。但是,非洲人的大量集聚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前在粤非洲人的社会影响已不容小觑,关于这一群体的研究亟待展开。

西方对国际移民的迁居现象研究较多,并主要集中在探讨迁居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有研究认为,国际移民受全球经济政治的影响较为明显,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种族或民族迁居的原因不尽相同(Phillips, 1998; Massey 等, 1993; Sanderson 等, 2009; Burnley, 2002)。一般认为,经济地位(承租能力)无论是对聚居区的形成还是移民流动的影响均较显著。个人背景(人力资本、婚姻状况、性别等)、社会融入(邻里关系、宗教信仰等)对移民居住流动的现象影响较大(Ley 等, 2005; Waters, 2005)。在空间形态上,迁居所导致的结果既可能是聚居也可能是分散。

对于在粤居住的外国人,一般认为其居住存在主动集聚和被动隔离的特征。例如,刘云刚(2010)发现,广州的日本移民主要为受企业派遣的旅居移民及其家属,受语言、民族性格、中国移民政策制度的影响,其生活活动空间相对孤立和封闭。在粤非洲人的居住呈聚居状态,其形成受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并处于动态变化中(Bodomo, 2010; Haugen, 2011; Berloncelo, 2007),生活成本、租金、临近工作地、警察的执法强度均对他们的迁居行为有重要影响。李志刚等(2008)对广州非洲人的社会区和族裔经济区的研究发现,广州的非洲人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或漂泊者,人口构成异质多元,流动性强,且在由全球到地方的多尺度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影响下,其集聚区的演化已历经兴起期、繁盛期和衰退期3个阶段,体现当代全球要素与地方要素互动的即时性与不稳定性(李志刚、杜枫, 2012)。尽管在粤非洲人存在较强的流动性,但总体数量呈稳定上升的特征。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发现,现有国际移民迁居的研究主要从社会网络等视角进行,但在粤非洲人的迁居受政府管控和社会支持与融入的双重影响,结合这两方面因素对该群体开展的研究尚不多见。目前学界对该群体的关注度不够,且研究区域多局限于广州。本文以广州、佛山地区的非洲人为研究对象,从政府管控、社会支持与融入的视角出发,将研究重点放在迁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上。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在粤的非洲裔外国人调查。该调查于2011年7月10日至8月6日在广州越秀区下塘西路、佛山南海区黄岐街道进行(梁玉成, 2013)。下塘西路和黄岐街道均是非洲人分布的集中区域。由于该群体的特殊性,这次调查采用的是“同伴推动”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 简称RDS),这种方法是针对少数和隐藏群体的抽样方法,经数次改进,形成了专门适用于对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和稀少人口的抽样、分析和研究(梁玉成, 2013)。“同伴推动法”调查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寻找“种子”(第一位接受调查者)。“种子”接受调查之后,介绍其他符合条件的被调查者接受调查,被介绍者完成

调查后又继续介绍新的被调查者,按这样的方法,样本逐渐增大;另外,调查得到有关监管机构的协助,从而顺利进行。两个地区共收回问卷 655 份,其中,广州越秀区下塘西路 349 份,佛山南海区黄岐街道 306 份。有效迁移信息的问卷为 588 份,有效率达 89.7%。

由于部分问题存在信息缺失,本研究利用 SPSS 中的最大期望算法(简称 EM 算法)将数据补齐,以使样本能得到充分的利用。EM 算法是一种迭代算法,主要采用后验分布的众数或极大似然估计,广泛应用于删失数据、截尾数据、成群数据等。有研究表明,对删失数据分布的参数估计和复杂的极大似然估计,EM 算法是有效的,估值精度满足要求(木拉提·吐尔德、胡锡健,2011;何建国、何瑞春,2009)。

(二) 描述统计

在广州和佛山的非洲人分布相对集中,可大致划分为越秀聚集区、黄岐聚集区、荔湾聚集区、天河聚集区、钟村聚集区、新华聚集区(见图)。其中,前两个聚集区是非洲人分布最多、最集中的区域。广州越秀聚集区主要包括越秀区登峰、洪桥、流花、矿泉、建设 5 个街道及白云区三元里、黄石 2 个街道。洪桥是非洲人最早的聚集地,小北路一带有众多非洲商铺和轻工业产品批发市场,以天秀大厦、陶瓷大厦中非商贸城最为著名。北边是登峰街道,以金麓山庄和宝汉酒店、湘鸿宾馆等为代表。流花街道内有广州火车站、省汽车站、白马商场、天马大厦、流花服装商场等大型的交通枢纽和服装批发商场,聚集了较多的非洲人。而矿泉、三元里、黄石街道的非洲人数量相对较少。佛山南海片区是近些年才形成的非洲人聚集区,具体包括南海黄岐、盐步、平洲和广州荔湾区石围塘街道,该区域服装等制造业发达,吸引了较多的非洲人。天河、海珠、番禺、花都等地聚集的非洲人规模相对较小。

由表 1 可知,在粤的非洲人主要来自西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几内亚及中非刚果地区、喀麦隆等,以男性为主,平均年龄为 31.6 岁,26~35 岁的非洲人占 63.3%,已婚或有伴侣的比例接近一半,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占 86.9%,整体水平较高。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掌握英语的人最多,可以应付日常生活或达到流利水平的占 81.3%,其次是法语,占 37.3%,而能听懂中文可以应付日常生活的仅有 15.1%。该群体有 79.9%是雇主,多从事贸易行业,交易的商品主要有衣服、鞋、家具、电器、手机等;他们大部分是通过商务签证来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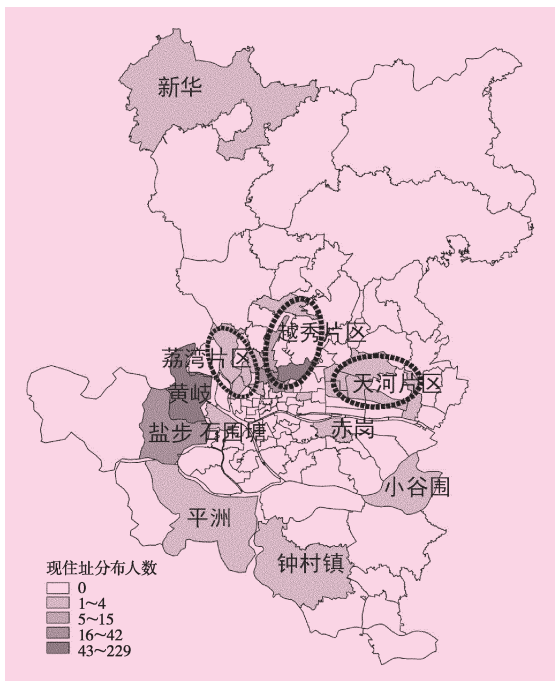


图 调查样本的空间分布

表1 样本的描述统计(N=588)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国家和地区			签证类型		
尼日利亚	189	32.1	商务签证	443	75.3
刚果地区	93	15.8	旅游签证	78	13.3
安哥拉	58	9.9	学生签证	42	7.1
乌干达	55	9.4	其他	25	4.3
加纳	34	5.8	受教育程度		
肯尼亚	27	4.6	文盲	5	0.9
喀麦隆	24	4.1	小学及以下	9	1.5
南非	22	3.7	初中及以下	63	10.7
几内亚	14	2.4	高中及以下	155	26.4
卢旺达	11	1.9	大专及以上	356	60.5
其他	61	10.4	参加宗教活动频率		
年龄			无	115	19.6
25岁及以下	87	14.8	每年少于一次	3	0.5
26~35岁	372	63.3	每年一两次	6	1.0
36~45岁	106	18.0	一年几次	15	2.6
46岁及以上	23	3.9	每月一两次	30	5.1
性别			几乎每周一次	32	5.4
男	480	81.6	每周一次	311	52.9
女	108	18.4	每周多次	76	12.9
婚姻状况			认识中国人的数量		
已婚或同居	265	45.1	1~5	263	44.7
单身	323	54.9	6~10	129	21.9
中文水平			11~20	103	17.5
完全不懂	156	26.5	21~50	64	10.9
掌握很少	343	58.3	51~100	14	2.4
可应付日常生活	73	12.4	100以上	15	2.6
流利	16	2.7	与中国人经济往来		
英文水平			从来没有	464	78.9
完全不懂	32	5.4	偶尔	30	5.1
掌握很少	78	13.3	有时	79	13.4
可应付日常生活	36	6.1	经常	12	2.0
流利	442	75.2	总是	3	0.5
法文水平			对中国未来收入的信心		
完全不懂	295	50.2	很低	19	3.2
掌握很少	74	12.6	低	58	9.9
可应付日常生活	14	2.4	中	83	14.1
流利	205	34.9	高	235	40.0
宗教信仰			很高	193	32.8
天主教	47	8.0	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基督教	481	81.8	很低	21	3.6
伊斯兰教	49	8.3	低	51	8.7
其他	11	1.9	中	54	9.2
雇佣状态			高	247	42.0
自己是老板	470	79.9	很高	215	36.6
受雇于他人	63	10.7	在中国有无房产		
无固定雇主	6	1.0	没有	486	82.7
其他	49	8.3	有	102	17.3

该群体信教比例较高,具有宗教信仰的占总样本的98.1%,以信仰基督教为主,而信仰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比例较接近,约为8%,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较高。他们所认识的在广东的中国人数量较少,84%的人认识的中国人不超过20人。

三、非洲人的迁居状况及影响因素

(一) 迁居状况

调查问卷中设置了相关的问题评估在粤非洲人的迁居情况,调查发现,他们的迁居行为非常活跃。在588个样本中,有迁移行为,即有两个及以上居住点的为365,占62.1%,有50%的非洲人在华时间超过1年。据统计,超过50%的广州、佛山的非洲人平均半年就会迁居1次。对有迁居经历的群体进行分析发现,75.6%的人会先选择广州作为第一居住地,第一站到佛山的人数较少,但与现住址进行对比,居住在广州和佛山的人数趋向均衡,广州有197人,佛山有168人。可见非洲人

来到广东后,先在广州居住的人数较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部分迁往佛山地区。在街道层面,第一住址的选择主要集中在登峰、流花、三元里、洪桥等街道,佛山的非洲人主要集中在南海区黄岐街道。在第一住址的统计中,广州越秀区登峰街道及佛山黄岐街道的移民数占总人数的 48.6%,而现住址在这两个街道的移民数所占比例高达 75%(见表 2)。可见虽然非洲人由广州迁往佛山的趋势较为明显,并呈扩散态势,但其迁居趋向于居住集聚,主要迁移到登峰和黄岐这两个街道,有宏观扩散、微观集聚的趋势。

(二) 变量选取

本研究选取个人背景、社会融入、生活工作、政府管控四大类共 23 个指标变量作为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解释。

1. 个人背景变量。不同社会属性的非洲人的迁居频率存在差异,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语言水平(中、英、法)五大变量衡量调查对象的特征。

2. 社会支持与融入。选取宗教信仰、参加宗教活动频率、认识的在广东的中国人数、与中国人借钱往来的频率来衡量移民的社会支持与融入情况。虽然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与黑人伊斯兰教徒基本上无直接交流(李志刚,2009),但总的来说,积极参加活动可以加强与本族群的联系,可获得来自祖国同伴的支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后两个变量则反映与中国人的互动情况,用于衡量社会融入状况。

3. 生活及工作。生活及工作状况对迁居行为存在影响,选取每周工作时数、工资反映移民在华的工作情况,选取通信或交通费、房租水电、在中国有无房产、人均居住面积、房屋居住人数反映居住情况。

4. 政府管控。在粤非洲人存在部分的非法移民,对政府的管控较为敏感。选取签证延期时间、查护照次数、查护照强度来反映政府管控的情况。但由于问题的敏感性,无法直接获得签证延期时长的数据,本研究通过计算问卷调查时间与“您最近一次申请签证延期的时间”的时间间隔来反映签证延期时长。“被检查护照的次数”直接由问题“在华生活工作过程中,您遇到警察查验护照的次数”获得,“被检查护照的强度”是指“被查护照的次数”与“在华时间”的比值,代表政府的执法强度。

(三) 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对单位时间(月)内所居住过的地址数(以下简称迁居频率)取自然对数值作为因变量(变换后更符合正态分布),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该群体的迁居状况及其与各种解释变量之间的关联性,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调整 R² 为 0.354,23 个自变量共解释了因变量的 35.4%,解释效果较好。

表 2 第一住址和现住址对比(前五位)

第一住址	人数	现住址	人数
登峰	106	登峰	115
流花	35	黄岐	95
黄岐	33	流花	18
三元里	21	洪桥	16
洪桥	19	盐步	15

注:由于部分样本的数据缺失,第一住址和现住址同时能精确到街道级别的样本为 280 份。

1. 个人背景变量的影响。个人背景变量中,性别、中文水平在1%的水平下显著。结果表明,女性比男性迁居更加频繁。就语言水平而言,中文水平越好,迁居频率越低,而法语水平和英文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中文水平高意味着社会适应性强,与中国人的沟通交流较好,能适应当地的环境。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迁移频率的影响不显著。

2. 社会支持与融入的影响。参加宗教活动可以帮助非洲人拓宽社会资源,争取潜在的社会支持,用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衡量该群体在本地区的社会适应能力。该指标在1%的水平下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68,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的非洲人迁居频率相对较低。但信

仰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三大变量均不显著,宗教信仰对迁居行为并没有影响。认识在广东的中国人数量反映了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情况,此变量并不显著,而与中国人的经济往来(向中国人借钱,或借钱给中国人的频率)反映了他们与中国人相互信任程度,该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与中国人经济往来越频繁,迁居频率越低。可见,认识中国人的数量并不影响其迁居行为,但与周边中国人的相互信任程度越高,居住地越趋于稳定。

3. 生活工作的影响。每周工作时数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工作强度不影响其迁居行为,工资、交通费对迁居频率有正向的影响,工资收入高或者交通费高的往往具备有较强的迁移能力。居住环境对非洲移民的迁居频率影响也不显著。

4. 政府管控的影响。在讨论政府管控的相关变量时,应注意到此次调查的对象包括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两大类,他们对政府管控的反应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护照检查强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执法强度越大,其迁居频率越

表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名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化 回归系数	t 值
个人背景			
性别	0.374***	0.116***	3.241
年龄	0.011	0.058	1.478
婚姻状况	0.086	0.034	0.960
受教育程度	0.008	0.005	0.149
中文水平	-0.308***	-0.174***	-4.608
英文水平	-0.063	-0.047	-1.054
法文水平	0.017	0.021	0.486
社会融入			
信仰基督教	0.138	0.043	0.433
信仰天主教	0.107	0.023	0.310
信仰伊斯兰教	0.417	0.093	1.208
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	-0.082***	-0.168***	-4.291
认识的在粤中国人人数	-0.028	-0.036	-1.023
与中国人经济往来	-0.182***	-0.122***	-3.526
生活工作			
每周工作小时数	0.002	0.043	1.252
工资	0.000***	0.093***	2.689
通信或交通费	0.000***	0.127***	3.640
房租水电	0.000	0.036	1.025
一起居住的人数	0.039	0.040	1.082
人均居住面积	-0.001	-0.025	-0.723
在中国有无房产	-0.108	-0.033	-0.950
政府管控			
签证延期时间	-0.030***	-0.264***	-7.212
查护照次数	-0.008***	-0.234***	-4.559
查护照强度	0.133***	0.230***	4.46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

高。执法强度影响的主要是非法居留的移民,这说明严打会加快非法移民的流动速度,躲避高强度的执法检查是他们迁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签证的延期时长、经历过的查护照次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签证的延期时间越长,被查护照的次数越多,移民的居住越稳定。这表明部分非洲人已经适应当地的执法状态,签证延期时间越长,被检查护照的次数越多,他们对地方的了解程度就越高,居住趋于稳定,这意味着移民非法的空间集聚性会增强;而合法移民并不需躲避警察的检查,迁居次数相对较少,其对应的被查护照数相对较多,因此从整体来看,被检查护照的次数与迁居频率呈负相关。

另外,从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不同因素对在粤非洲人的迁居频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管控力度的影响程度最大,社会融入度次之,生活成本及性别的影响较小。在粤非洲人整体上呈现出被动迁居的特点,受政府检查护照、居民接纳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较明显。

四、结论及讨论

经历在中国多年的发展,非洲人在广州、佛山地区的迁居和集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可以大致概括为两大方面:(1)迁居的特点。在粤非洲人的居住空间呈现宏观扩散微观聚集的趋势。宏观扩散主要体现在城市尺度,他们早期主要集中在越秀区广州火车站附近,现在扩散到番禺、海珠和佛山南海等地,形成新的聚集区。他们主动脱离原来的社区,寻找新的居住空间,不断融入中国社会,呈现扩散的趋势。具有合法身份、适应能力强的人会寻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而生活在较底层的人则会迁到邻近的执法环境相对宽松的区域,整体呈核心—边缘格局。但在街道层面,集聚性增强,他们不断迁居到登峰或黄岐,其他街道的分布规模较小。传统的集聚区无论是在社会支持还是当地居民的可接受程度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有利于非洲人的初始发展。(2)迁居的影响因素。该群体的迁居行为受经济因素、社会支持与融合、政府管控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收入高意味着承租能力强,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喜好和需求改变住所,体现出主动的迁居行为。社会支持度大、社会融入度高的移民往往拥有良好的社会网络,与身边的中国人和谐相处,居住稳定。他们可以通过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等方式来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并从中获得支持,参加宗教活动频率高的移民居住较稳定。但迁居频率受政府管控的影响较明显。总体而言,迁居可以提高对环境的熟悉度,增强生存适应性。非洲人在粤的迁居本质上是与当地居民和政府博弈并积极寻找发展机会的过程,政府的管控力度和居民的态度影响其居住选择,虽然他们迁居起于被动,但会主动去适应,并积极通过现有渠道挖掘社会资本的优势,选择合适的生存空间。迁居是非洲人适应地方的一种重要手段。

总体而言,在粤非洲人的迁居情况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移民存在共性,但也存在显著差异。西方的研究一般认为经济因素是移民迁居的主要动力,虽然工作收入等经济因素对在粤非洲人迁居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但他们迁居更主要是为了寻找社会接纳度高、政府管控

较宽松的居住环境;对于非法移民而言,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躲避护照的检查,降低被遣返的风险,其首要目的是生存,而非提升生活质量。群体的高流动性会给管理带来一定困难,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并同时考虑合法与非法移民的共性与差异,采取适当的策略。鉴于高强度的执法有可能造成非法移民的恐慌,加剧他们的流动,当地政府应考虑通过提高社会的宽容度、合理引导宗教活动等方式降低移民的迁居频率,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何建国、何瑞春(2009):《居民出行 OD 调查中数据缺失问题及其 EM 算法研究》,《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第 3 期。
2. 李志刚、杜枫(2012):《“跨国商贸主义”下的城市新社会空间生产——对广州非裔经济区的实证》,《城市规划》,第 8 期。
3. 李志刚等(2008):《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地理学报》,第 2 期。
4. 梁玉成(2013):《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果机制——累积因果视野下的移民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5. 刘云刚等(2010):《广州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与生活空间》,《地理学报》,第 10 期。
6. 木拉提·吐尔德、胡锡健(2011):《EM 算法在删失数据分布和混合分布参数估计中的应用》,《统计与决策》,第 15 期。
7. Bertoncello B. and Bredeloup S. (2007), The Emergence of New African “Trading Posts” in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China Perspectives*. Vol.6(1):94-105.
8. Bodomo A. (2010), The African Trading Community in Guangzhou: An Emerging Bridge for Africa-China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03:693-707.
9. Burnley I.H. (2002), Evolution of Chinese Settlement Geographies in Sydney, Australia. *Urban Geography*. Vol.23(4):365-387.
10. Haugen H.Ø. (2011), Chinese Exports to Africa: Competition, Complementarit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Micro-Level Actors.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8(2):157-176.
11. Ley D. and Kobayashi A. (2005), Back to Hong Kong: Return Migration or Transnational Sojourn?. *Global Networks*. Vol.5(2):111-127.
12. Massey D.S. and Arango J., et al.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9(3):431-466.
13. Phillips D. (1998), Black Minority Ethnic Concentration, Segregation and Dispersal in Britain. *Urban Studies*. Vol.35(10):1681-1702.
14. Sanderson M.R. and Kentor J.D. (2009),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1970-2000. *Social Forces*. Vol.88(1):301-336.
15. Waters J.L. (2005), Transnational Family Strategies and Edu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 *Global Networks*. Vol.5(4):359-377.

(责任编辑:朱 犁)